

章實齋著

文史通義

中華民國十五年 八月二十日四版

新式標點

文 史 通 義

不 得 翻 印

點校者 崑山陶樂勤

發行者 黃濟惠

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

△分館 杭州保坊
△代發行所 南京花牌樓
△各省各大書局

章實齋先生評傳

曹聚仁

從乾隆初年到嘉慶末年，這八十年間，清代學術界可說是瑰奇壯麗極了！學術思潮之有聲有色，和滿清的國運互相輝映。攷證之學，有惠定宇，戴東原兩大師出，成爲有目的有方法的研究。直到王鳴盛，錢大昕，汪中，任大椿，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輩出，樸學的成績十分燦爛了。在史學方面，萬季野，金祖望而後，便有會稽的章實齋。我們讀他所著的文史通義，他的見解，會使我們十分驚異！他彷彿是滲透了科學精神，開始用科學方法來治史。邵晉涵說：「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蠶開山。」這話章氏的確可當之而無愧色！

先生姓章，名學誠，號實齋，浙江會稽人。生於乾隆三年，和當代大儒戴東原，邵晉涵，汪中，武億，洪亮吉，任大椿，朱筠輩都年相伯仲。「二十歲以前，性絕駸滯。讀書日不二三言，猶不能久識。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於史學，蓋有天授。」

廿五六歲時，肄業國子監，和同志往反論文，輯有「壬癸尺牘」。（此書已失）又和新寧甄松年討論修志，前後共有四信。（見文史通義外篇三。）三十四歲，和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等在太平使院。那時，他的先生朱筠做了安徽學政。三十六歲，撰和州志例。三十七歲，撰和州志四十二篇及志隅二十篇。四十歲時，周震榮延先生主修永清縣志。四十二歲，永清志成；那年還著有校讎通義四卷。四十四歲，主講於肥縣之清漳書院。四十六歲，主講敬勝書院，撰文史通義十篇。五十歲主講文正書院。五十一歲，在歸德院中校正校讎通義，得文史通義十篇。五十二歲，在亳州，修亳州志，又撰文史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五十三歲，在武昌，編史籍攷，襄助畢沅編續通鑑。五十五歲，任湖北通志。五十七歲，湖北通志脫稿。五十九歲，續撰文史通義多篇。六十一歲，補修史籍攷。（全書不傳）嘉慶六年十一月，先生死，年六十四歲。

（注）本段所列先生事略及著述，依據胡適氏底章實齋先生年譜。

要了解先生的思想，當然非從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二書中去攷實不可。如今把最重要的列出，約有五端：

A, 論學術的起源，

B, 論修志，

C, 論修史，

D, 論學問與功力，

E, 論目錄之學。

* * * * *

章華綬——先生的兒子——云：『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主義，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蠅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我對於這幾句話十分表示滿足，因為他已把他父親的根本思想完全告訴我們了。一般人對於易數上中下三篇，都以爲太迂；其實先生的根本思想就在這裏面。他說：

『六經皆先生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亦非託於空言。……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

家之學也。』

韓君彷彿是狼受了「諸子出於王官」說的影響，以致牽強附會，十分可笑。可是否認了他這個主張，便牽動得很大，也許影響到他的思想中心點。因為他是主張古代學術都是「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以為，「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典之故，可謂無不備矣。」所以他可說：「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向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所以他可說：「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者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所以他可說：「諸子百家，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因此他後來主張：「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攷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求書之時，

按籍而稽，無勞搜訪；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
•』又主張：『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散典故，黨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員跡，彙冊存庫。』

我們固然不能贊同他所說「諸子出於周官」的話，可是他那崇周官之方式，以爲「治書之要」，和立志科的主張，不能不說是很確當的。

* * * * *

先生處遠矚千古的史學，可惜竟沒有給他修國史的機會。費盡心血的湖北通志，也幾乎敗於豎子之手。幸在先生所主修的縣志府志裏，可以找出他的心血之花。他所主修志乘凡六：一，和州志；二，永清縣志；三，亳州志；四，常德府志；五，荊州府志；六，湖北通志。只要看各志的體例，就可看出他思想上的進步。

和州志	阜言紀	官師表	選舉表	氏族表	輿地圖	藝文書	政書	列傳	闕訪傳	前志傳
永清志	阜言紀	恩澤記	職官記	選舉記	輿地記	水道圖	六書	政略	列傳	闕訪傳
亳州志	增人物	表掌故								
常德府志	紀二十四	表四	略一	傳七						
荊州府志	紀表	表攷	傳攷	文攷						
湖北通志	通志七十四	篇二	紀三	表五	政六	傳五	掌六	篇六	吏科	戶科
附注	聚仁因人	事的牽繫	，不能走	訪亳州志	及常德荆	州二府表	，只能因	陋就簡，	把胡適年	表中間列
									的抄在此	表中。

他的修志主張，散見在答甄秀才論修志書，人物表例議，掌故例議，輿史餘村書，寄錢大

所書，與陳詩論湖北通志書，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方志立三書議等篇中。大概發端於答甄秀才時，而成熟於修亳州志，到了湖北通志，那更完成了。

他的修志大法是：『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他自己解釋其義云：『昔隋儒王通嘗謂古史有三，詩，書，與春秋也。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徵義本十五國風。古者各有師授淵源，各有官司典守。後世浸失其旨，故其爲書，離合分併，往往不倫。然歷久推衍，其法漸著。故唐宋以來，正史而外，有會要會典以法官禮，文鑑之類以仿風詩；蓋不期而合於古也。』先生的修志見解，自信頗真。曾對周永清道：『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如有良史才出，讀毫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爲開山之祖，卽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

先生和戴東原的修志主張多不相合：戴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先生則以爲『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攷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立，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這便是史學家的特識！」

* * * * *

書教上中下三篇是章氏史學的結晶。精到之處，爲劉知幾，鄭格諸人所不及。篇中要義，摘錄於左：

（上篇）『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

（下篇）『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尙書一變而爲左傳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記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

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左氏編年，不能典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蓋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記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世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遷鑑於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舍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懸括，無遺無滯。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沈思冥求，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以尚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敢以文衡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

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列傳本體）或錄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記，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嚴，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模範，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此中有二重要主張：

A，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法欲其方以智。

B，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滯。文省於記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簡書之遺也。

先生對於劉歆七略班固藝文真能賞識，別有會心；校讎通義互著中有云：『古人著錄』

，不徒爲用乙部次計。……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絃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入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誠可以使那些株守四部的人們明白自己的固陋。只可惜他還不能竿頭再進一步把四部九流的界限完全撕破他！』

* * * * *

胡適氏對於清代學者有狠確當的批評：『諸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並且在那熱潮中，着了色盲病，連常識學問的能力都沒有。戴東原自謂：『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不料他的學說雖風動一時，這書却影響很小。洪榜替戴做行狀，裏載與彭尺木書。朱珪却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是。』那時學術界的盲目可攷見了。章氏却不曾同流合污，對於肇續補苴的文學家，表示不滿意；在書後旣謂：『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攷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爲戴之絕詣如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

，是固不知戴學者矣。』在博約篇又謂：『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度數，貫串旁驚，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相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爲學，是猶指稊黍以爲酒也。今之俗儒，……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其批評汪中又謂『江都汪容甫工詞章而優於辭命；……無如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爲內篇者，大約難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紛然蠶出者亦當列於新籍，不但不可爲「內」，亦併不可謂之「外」也，而况本無著書之旨乎？』這些都是確中時弊，無一語是空疏的。在現今學術界，我以爲他的話還有時數，一般人對於學問功力兩者正模糊不明呢！

先生最能了解學術源流，也最能認識目錄之學的效能：『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這方法如今還可用以爲整理國故之一助。可惜他的史籍攷，已不傳。（胡適氏所書年譜中，列有史籍攷總目及修史籍攷要略）

* * * * *

先生的重要思想，上文略已講及。其他偏及固執之處，我們只要明白思想和時代有關係，那就不會求全責備了！

標點本的文史通義已要再版。我趕做這篇評傳來介紹實齋先生的根本思想，疎漏之處，還望讀者指示我！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

陶序

會稽章實齋先生，清代大儒，長於文史，尤擅方志。先生著述，海內傳誦；而其批評文史，不稍假借。以余觀之，其研究文史，深得邏輯法。

文史通義，爲先生批評文字之結晶，爲先生著述之代表，可以推諸百世而準，胡適之先生曾贊揚之不遺餘力，誠爲吾儕研究國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以前刊本，未加標點，國學稍遜者，以句讀難分，雖知名著，多望而却步也。

梁溪圖書館主黃君濟惠有刊行國故之宏願，以先生文史通義屬爲點校。余不揣鄙陋，毅然從之，謬誤之處，焉能自免，而願先生鉅著廣其流傳之心，當爲閱者所共喻也。

再先生校讎通義，爲我儕學者整理國故之具，點校而刊之，請俟異日。

民國十三年九月後學崑山陶樂勤謹誌。